

沈阳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衰败文化中的家族、历史与自然——论叶广芩的小说创作

姓名：王雅洁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季红真

20100301

# 衰败文化中的家族、历史与自然

## ——论叶广芩的小说创作

### 摘 要

从京腔京韵的家族叙事到厚重质朴的《青木川》，多样的题材书写中，却始终带着作者深沉的历史宿命意识和文化悼亡的忧伤、悲壮的诗情。无论是清朝贵族子弟的悲剧命运，还是处于文化边缘的历史子遗慰安妇、汉奸和土匪等，都包含了作者对文化衰败的悼亡与人性的探寻。就是以动物叙事为主体的寓言写作中，也启示着以萨满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的溃散与拯救的可能。她以衰败的文化为大的视角，审视着家族、历史与自然，在肃穆的祭奠性写作中，也还原了渐行渐远的文化场景，小说成为挽歌式的绝唱。她以这样的方式对抗污浊、浮躁、混乱的世相，建立起自己心灵堤坝的同时，也为读者开辟了精神的家园，汇入人文精神的时代主题，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文化精神重建的伟大目标。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品的细读来探讨叶广芩艺术世界的基本秩序，这就是在对衰败文化的书写中，观照家族、历史与自然。这是她自我确立的文化坐标，也是叶广芩的精神向度与悲悯情怀。

本论文主要分三个章节。第一章叶广芩通过《采桑子》和近期京剧系列的书写，完成了自我的确立。由种族身份确认，到文化精神的阐释、贵族精神的的确立，再到民族伦理共同体的归属。这是一个螺旋型的思维发展轨迹。第二章主要分析叶广芩的历史小说。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真相难以还原的尴尬，都是虚无感形成的诱因，而人性的复杂则是这虚无感最根本的原因。在两者同构的叙事迷宫中，叶广芩完成了自己独特历史观的建构。第三章主要分析叶广芩的动物叙事，作者以对动物的书写转喻出传统的自然观，小说具有文化精神寓言的特质。这种对自然生命尊重敬畏的自然观，其本源根性来源于满族文化的核心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与生命价值观。

关键词：叶广芩；衰败的文化；家族；历史；自然

# **The decline of the family culture, history and nature**

## **——Ye Guangqin of Fiction**

### **Abstract**

The clan from Beijing dialect Beijing rhyme narrates to plain <Qingmuchuan>thick and heavy , various subject matter writes middle, but wears deep fatalistic author histo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distressed , solemn and stirring poetry that culture mourns the death of all the time. Disregarding being tragedy of Ching dynasty nobleman children destiny , still being that border history Jue loses comfort women , traitor and brigand in culture and so on,mourning self deceased wife having contained an author being at a low ebb to culture and the human nature exploring searches.In the allegory writing being to narrate with the animal for the main body, possibility that the enlightenment also is burning being that the core tradition culture is vigorous with Shamanism collapse in disorder and save. She takes the culture being at a low ebb as big visual angles , nature writing is hit by be scanning the clan , history and natural, in solemn holding a memorial ceremony for, have also restored doing gradually distant culture gradually circumstances, the novel becomes dyadic peak of poetic perfection of dirge. She uses such way antagonism dirty , flighty and rash , the chaos world looks at and appraises, simultaneous building up self intelligent dike and dam, also is that reader has opened up vigorous home, vigorous abouchement humanity times subject, the way with literature has participated in culture great target that the spirit rebuilds.Thin trying to pass pair of work reads the main body of a book coming to discuss fundamental the Ye Guanqin art world order , this is in writing checking instauration culture , watch according to the clan , history and natural. This is her culture that oneself establishes the coordinate, is also that be a Ye Guangqin's most, the spirit faces degree and has sympathy for feelings.

The thesis divides into three chapters and sections mainly. The first Ye Guangqin pass <Caisangzi>and recently Beijing opera series writing , establishing having accomplished oneself. From race dignity confirmation to, culture vigorous expounding , belonging to arriving at vigorous establishing of nobleman , arriving at the nation ethics community again. This is a trajectory that screw-type thought develops. Second chapters analyse Ye Guangqin historical novel mainly, history diversity , complexity and deoxidation of truth difficult to

pretty pass, be that nihility feeling forms an incentive, but the human nature complicity is that this nihility feels the basicest cause then. The maze has been middle in same structure narrating of both , Ye Guangqin has accomplished self distinctive conception of history construction. Third chapters analyse Ye Guangqin animal mainly narrating , the author rotates the conception of nature informing out tradition with writing to the animal , the novel has culture spirit allegory particularity. This checks natural life respecting the conception of nature respecting, whose origin na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Man nationality culture core Shamanism primitive conception of nature and life outlook on values.

**Key words:** Ye Guangqin ; Cultural decay ; Family ; history ; natural

##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_\_\_\_\_ 日期：\_\_\_\_\_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授权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将本人硕士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有权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作者签名：\_\_\_\_\_ 日期：\_\_\_\_\_

## 绪 论

### 一、研究现状

叶广芩，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她的文学创作，从为她赢得巨大声誉的家族系列到旅日小说、动物叙事及近期末完成的京剧系列，其创作的笔墨与其行走的轨迹高度吻合，而对叶广芩的研究也随其行走的写作而变换着脚步，对各方面题材都有所涉猎。

对于使叶广芩享誉文坛的家族系列，因其厚重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家族故事、精巧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文化反思，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是评论界反复阐释的文本。有论者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了叶广芩创作的深层动因，并对她的视角越界做了深刻的探讨；而多重的创作动机也造就了叶广芩对家族文化的两难态度与自我对立；还有人将庞大的金家系谱归为四类不同的命运形态，但却殊途同归的演绎了生命悲剧；还有些评论将叶广芩同老舍、邓友梅、王朔进行比较，也都是轻轻划过。虽然家族系列的研究比重较大，但部分论文仍重复以往的研究结论。而且这些评论多将反思传统文化和作者对于家族的眷恋对立，而忽略了作家对于种族文化身份自我认同欲求和追寻，在时间的向度上必然从反思过去，面对当下指向未来。而“贵族精神”正是作者在反思检讨传统文化过后，萃取出的文化精华，成为自我确立的基石。叶广芩的民族满族文化心理是开放的、流动的，她的目光没有锁定在贵族阶层，笔下流泻出小人物的人生命运，由此达到对苦难人生的普遍悲悯。

旅日小说系列由七部反思中日战争的中篇构成，叙述的是战争中诸多的生命现象，以及战争遗留的问题，“触及的却是深藏在战争背后的历史困局、文化价值冲突、人性复杂度等更为恒久和复杂的问题，使我们在回顾战争历史，经历激烈的文化碰撞后，可能会坦然的面对文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并自信的走向自我完善”。而在作品的书写中作家表现出的超民族意识、超时代意识和超道德意识，体现了叶广芩拥有的开阔胸襟、大气的风格，是真正的超性别写作。因为国内读者和研究界更多关注叶广芩的家族系列小说，所以对旅日小说关注不足，忽视了旅日小说与家族系列所拥有同等的重量，也忽视了题材的演变中，文化精神新的升华，给我们留有很大的言说空间。

进入新世纪，叶广芩挂职陕西周至县委，深入到秦岭腹地，关注动物与生态保护，这使她的生命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创作出一系列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关注动植物的生存状况的生态系列小说。而以往对于动物叙事，多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评论。有论者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认为“其生态文学运用生态整体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从生态视角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人文主义的内省，对于生态道德的建立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有人在肯定叶广芩鲜明的生态意识的同时，对其小说所宣扬的回归自然进行否定，认为其是以牺牲文化为代价的，对人而言则是可悲的沦落与返祖。而唐克龙的《动物的“高贵与庄严”：论叶广芩的动物叙事》认为叶广芩的生态观念和“敬畏生命”的动物伦理主要来自她在基层动物保护区的独特经验。并没有意识到作者的满族文化身份，满族文化精神中的萨满信仰，才是她亲近自然习性，尊重自然生命价值的本源文化精神的根性。正是这种萨满信仰影响了她的动物叙事，并完成叶广芩自然观的建构。

在之后的长篇《青木川》中，各色人物欲望的相撞让古老又现代的青木川，演绎了一出人性的故事，历史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增强了故事的张力，“而众多的疑惑串结起来并集结于现实，完成一种判断、一种感叹、一种记忆和经验的磨擦，以及‘革命’、‘土匪’、‘爱情’、‘文化’的历史融合和诗意摹写”。《青木川》采用复调对话的叙事模式，解读历史以及时代与人命运的复杂关系，揭示人性的深邃，理想与责任的高贵。也有论者认为作者阉割了大历史又沉沦于小历史，使小说中的历史成了一种偶然无定的漂浮物，一些内容缺乏审美依托，陷入了强烈的非理性色彩的心造幻影之中，也暴露出一些技术和写作上的窘迫。

然而各种题材的写作之间并不是一种断裂状态，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品的细读来探讨叶广芩艺术世界的基本秩序，这就是在对衰败文化的书写中，观照出家族、历史与自然。

## 二、研究思路与意义

叶广芩本人系清代显赫皇亲叶赫那拉氏的后裔，这是一个著名而辉煌的姓氏，以出皇后而著名，从高皇帝努尔哈赤的孝慈高皇后到景皇帝光绪的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中先后有五位姑奶奶入主过中宫，至于嫔、妃之类就更不在话下了。辛亥革命后，这个家族才简姓“叶”。虽然这个贵族世家曾给叶广芩留下了最痛苦不堪的回忆，一种摆脱不了也亲热不来的“冷漠感”，但其中血缘的宿命始终是她理解生命价值的逻辑起点。在这里，叶广芩深深的扎下了情感之根，萌发了文学叙事的胚芽，在自己的创作中，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满族贵族文化胎记。在时代进步，政治文化环境宽松和谐的气氛下，这尘封已久的痛苦往事，被时间的酵母催化，分解了粗砾与苦涩，飘出了浓郁的酒香——家族书写。这是一种深刻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当下文化建构的沉思，也是对自己种族一种爱怜的回望与宽容的理解，由此确认了自己的种族文化身份。以《采桑子》和《逍遥津》等一系列未完成的京剧题名系列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对于家族历史的总体言说，作家通过血缘、情感、以及家族溃败的历史原因，为备受嘲讽的满族贵族正名。而这种对逝去的家族怀旧的浓浓情感，在哲学意义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于自我本体绝对存在进行印证与确认的绝佳方式。并且在客观展现没落贵族的生活轨迹、民族历史、文

李艳妮：《生态文学的美学之维——论叶广芩的生态文学创作》，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4月，第9页。  
王鹏程、袁方：《在历史的缝隙里窥视“土匪”的秘密——论叶广芩的《青木川》》，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1，第160页。

化演变中,挖掘重塑了满族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个性,借助现代民族融合中的边缘立场,以溃败民族中的贵族精神,完成自身价值的建构。而这种精神价值主要体现在作家笔下的人物身上,他们虽然劣迹斑斑却固守着贵族的精神家园,七哥、五姐夫都是这样的守灵人。但这种“贵族精神”没有囿于家族和传统,而是丧失了世俗特权之后、修正了与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贵族精神”,是解放了自我囚禁的“贵族精神”,是面对当下现实、吸纳了现代思想的开放的“贵族精神”,是具有超越性、自由性、高贵性的灵魂栖息地,而且贯穿了叶广芩的全部创作。近期的京剧系列是对家族题材回归性的书写,只是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满族下层贫苦旗人,但是贵族文化精神延续在他们的身上,并拓展与升华为人格的魅力。《状元媒》、《大登殿》关注了女性的命运与气节;《逍遥津》中的贵族之家,面对文化空间继而是生存空间的双重丧失之后,终于复苏了人的尊严,走向对于外族的反抗,为追求自由、平等、解放,而归属于中华民族的大伦理共同体中。由此,叶广芩的文学精神也从种族身份的自我确认,到贵族精神的自我确立,发展升华为民族大伦理文化身份的自我巩固。

旅日小说中的《雾》、《风》和《青木川》,这些叶广芩笔下的历史小说,都对历史、时代与人的命运的复杂关系、人性复杂度等更为恒久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寻。并且以博大的生命意识关注历史中被遮蔽的土匪、慰安妇和汉奸这些边缘人,在暧昧的文化身份与模糊的种族立场中,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虚无,也正是在这种历史价值的质疑与思索中,新的历史言说方式被建立起来。在动物系列中,叶广芩用有别于以往动物叙事以人为中心的书写方式,以自然在场的叙事策略,表达了对自然敬畏的情怀,不能不说与满族游牧文化中原始宗教萨满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在满族文化精神中,萨满信仰是渗入血液的独特文化标记,作为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古老宗教,万物有灵的意识记录了他们与自然相处的独特方式,以及在这个方式中对自然生命深深的敬畏,积淀内化到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形成自己牢固的宇宙观与生命价值观。虽然入主中原,但是享受铁杆庄稼的满族后代,没有完成向农耕文化的转型,使这样的信仰得以流转,只是随着政治史的场景转换,消解了仪式之后残存在日常生活方式的细节中。而叶广芩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态意识,则是被覆盖的种族记忆中萨满信仰诗性的外化,成就了她动物叙事的独特文化寓言品格。

这些都使叶广芩的创作拥有了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意义。文化史上,提供了在历史激荡的年代中丰富的未被客观言说的满族文化的世俗生活资料;在思想史上,提供了边缘家族的边缘立场与原始的萨满文化中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文学史上,重现满族贵族的文化性格,延续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老舍开创的开创满族人物系谱,丰富了其中的人物形象,拓展了文学表现的审美空间。并且以诗、文化寓言、方志、民间传奇、戏剧等多样的文体,为小说的叙事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



## 第一章 诗化情感形式中种族身份的确认与归属

满族在历史上曾书写过辉煌，但却没能扭转外族入侵，家国溃败的命运，作为统治民族，满族必然遭到整个民族的谴责。而在现当代文学画廊上，骄奢淫逸、醉生梦死、软弱无能，空有皮囊，腐朽没落几乎成了满族人典型性格的代名词，与之相关的倒卖古董、痴迷京剧、请安礼仪等文化景观，令人嗤之以鼻，而那种倒驴不倒架的穷讲究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以此映照出满清封建王朝衰朽不能自拔，在整个民族危难时刻，无以担当的历史必然。而在叶广芩家族叙事的书写中，她敢于正视这些自己种族的劣迹，带着一种经历沧桑之后爱怜的回望与宽容的理解，彻悟历史人生的达观，书写出家族与民族不可挽回的溃败，以及贵族子弟们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这是一个勇敢的书写者，她没有逃避，而是作为满族贵族的代言人，承担了民族衰败中的种种生存悲剧，并对人性的卑劣，对命运的荒谬进行审视。并在现代多元文化语境的重新关照中，确认自己种族身份的同时，也认同了剔除封建特权之后的满族文化精神，借助其中的贵族精神完成对世俗社会的心灵抵抗，最终达到精神价值的自我确立。这是作家独特的文化视域，作品呈现出她精神挣扎的轨迹与超越的高度。

### 一、片段的家族史叙事与整体的诗性凄凉

《采桑子》作为一部传统家族小说，并没有严格遵循编年史的时间形式结构全文，而是采用与《水浒传》《呼兰河传》相同的叙事结构，即独特的串联式结构，用九个小中篇，讲述着既相关又游离的家族片段往事，篇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血缘关系的潜流相通。这种结构拥有叙事的自由与充分展示人物性格命运的空间，“在组装过程中，我们会有对世间物体结构可解模式的惊讶以及可以通过一点点的组装而终于获得一个看上去浑然天成的事物的惊喜”，“在被拆卸下而独立成篇时，看上去也是精湛的艺术品”，使小说拥有一种诗意的跌宕，让人沉醉的艺术效果。不仅如此，《采桑子》的文体结构是富含意味的。根植于同一血缘的家族成员，在人生的历程中遭遇了不同变故与挑战，或许生命个体偶然地、部分地呈现家族命运的某个侧面，只是家族历史坐标上的一个点，但连缀起来，就呈现家族史变迁的基本轨迹。更何况这种文体恰好影射出这个贵族世家的离散状态，历史的无从把握，将自己的情感形式纳入到文体中去，并上升到人生观的高度。对于叶广芩来说，表现种族历史溃败中家族的离散，这种结构应该是匠心独具的最佳选择。只有片段式的记忆，而没有家谱式的严格顺序，正好容纳碎片一样崩溃的末世人生，形成了她家族史叙事的特殊形式，具有悼亡仪式的庄严与凄凉，是挽歌式的写作。

《采桑子》的总题语义关联即广泛又有限。它又名《罗敷艳歌》《罗敷媚》，四十

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2月，358-359页。

四字的小令来自大曲中的片段。历经朝代的更迭，以不变的语言形式，承载了变动的时代生活，它因南唐冯延巳的“小庭雨过春将尽”开始的26首词作而著名，历代词家都有名句镶嵌其中。它从一开始就是世俗生活场景的情感抒发，伤春的孤独与凄凉的人生喟叹，规定了情感内容的性质，即使在豪放派手中，也没有英雄江山的感怀，更多人生“欲说还休”式的失意。这两个方面都契合了叶广芩家族史叙事的需要，她以满族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区别宫廷为中心的贵族家史叙事，她的人物都是以情爱为中心演绎着悲剧的结局；而凄凉的情感基调也是末世人生最普遍的感受，她回望家族离散过程中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而与她同属一个种族，以“哀感顽艳”的风格著称的杰出词家纳兰容若，更是有多首词填在这个词牌中，《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这首词，从字面上看来是一阕朦胧的爱情词，“谢娘”是唐宋以来诗人词客对自己恋人的称呼，而“谢桥”是恋人的住所。整首词传达了对恋人深深的幽思怀恋，孤苦无聊的苦情。而在这凄婉悱恻、哀怨动人的词情背后，还隐藏着纳兰性德对于社会与人生的空寞感，身处毫无希望的家族末世，目睹政治斗争的残酷、官吏队伍的腐败，尘世人生的飘摇难测，风雨凄凉，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悲哀、空幻、末世之感油然而生。正如梁启超所认为的，此词有“时代哀音”，“眼界大而感慨深”。显赫皇族地位的衰落，给予词人纳兰性德的空幻、末世之感恰好与贵族世家留给叶广芩的那种莫名的惆怅和深重的文化忧患，在情感上达到共鸣。但始终是皇族的一员是不争的事实，“一种文化状态失落之后在作者心理上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和迷惘”，所以“就有更多的笔墨来描述自己的家族，来希冀世人的理解或者自己获取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叶广芩的小说《采桑子》以纳兰性德的《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中的词牌、词句命名作品，除了《采桑子》后记中表达的缅怀先人之外，还要借其凄婉深沉的寓意表达感伤情怀，早早的为小说定下了忧伤诗化的情感基调，将作者的心灵颤动，编织在这个词牌的形式中。作者用九章叙述了清末皇族金家14个子女，面对时代变迁、家族衰落的境况，或沉或浮、或守或变，但殊途同归都以悲剧收场的命运。《谁翻乐府凄凉曲》中的大格格为京剧生、为京剧死的哀婉缠绵；《风也萧萧》中的二格格离家后对于家的怀恋；《雨也潇潇》中的三哥背弃传统人格后掘心自食的痛楚与麻木；《醉也无聊》中的五姐夫高学历与糊火柴盒度日的窘境；《曲罢一声长叹》中的画家七哥无钱治病，却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尊严，其中的人生况味更是凄凉。而最后一篇《曲罢一声长叹》的篇名，则来自于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满庭芳·梦中缘》，历来也是因对现实的失意而回归世俗情感的寄托。而“祖坟”的消失象征着这个显赫家族彻底溃败，溃败得不留一丝痕迹，只有无限的怅惘与哀叹，字里行间透着无法抗拒的历史变迁的沉重感，时代的哀音不但不曾消散，反而还增添了一层对于古老的家族精神温情的悼亡，留得一声悠长的叹息。而从命名开始的忧伤诗化的叙事基调，不仅是作者对于金家这个贵族世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也是对曾经叱咤于政治舞台的整个满族历史溃败的情感祭奠。全书九篇，九九归一，归纳在意蕴深

马国栋：《文化意蕴·双重视角·民族身份》[J]，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4月，第35页。

马国栋：《文化意蕴·双重视角·民族身份》[J]，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4月，第35页。

远的书名下，形式也具有暗示性，概括了从皇家到民间，所有溃败命运的共同凄凉境遇，忧伤的诗化悼亡哀音便超越了时代，传达了更广大的历史悲悯，使她的家族史写作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

作者用忧伤诗化的叙事语境，将祖宗、亲情、伦理等温暖的话题传达给我们，作家叙述得不动声色，却深深地触动了每个人有关家与根的情感思绪，大到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生命的情缘谁都难以割舍。而反过来看，这种凄凉的基调，激活了她的创作灵感，不可割舍的浓浓血缘亲情是心灵的泉水，滋润了她整个的艺术世界。整部小说在情与理的纠葛中，以多元文化的撞击交融为坐标，回望家族命运，文化的震动比政治的变迁更深刻地影响着家族的命运，面对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的末世子孙，她不仅有理性的反思、臧否与深刻的理解，更多感情的依恋与眷念，在感同身受的命运认同中与所有悲剧角色荣辱与共。这是出身带来的割舍不掉的根性的，血脉性。首篇《谁翻乐府凄凉曲》，对金家显赫的家族历史进行了追根溯源，将家族的历史与满族开国定制的历史交织着闪回叙述，辉煌的家世追述与现实窘困的现实处境交相呼应，彰显强化出作者和作品中人物无法回避的满族血液与清朝贵族的身份。作者以满族为之痴迷的京剧——老生、老旦、花脸、青衣、小生等角色的分类，隐喻着所有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金家子弟在此全部出场，生动的呈现出金家人物系谱的生态画卷，与她满族先辈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黛玉进府一节的艺术构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也都表明叶广芩自觉继承先辈作家优秀艺术传统，不可抗拒地被自己民族的文化所吸引所魅惑。而作为整个家族故事的叙事者和部分亲历者，整个故事以“我”的视角，扫描出交织在“我”的血缘网络中的兄弟姐妹，父母亲族不同的人生遭际，虽然各自的命运不同，殊途同归结束于共同的悲剧，不能不说贵族身份是悲剧的原因之一，这使她笔下的悲剧接续着古希腊悲剧的基本特征，带有个人无力反抗的宿命色彩。但叙述者“我”没有逃避这种血缘宿命，反而认为自己有责任给亲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完整，就像在《谁翻乐府凄凉曲》一章中所说的：“一代名票，有始无终，难免让人觉得遗憾，让人觉得不完美、不满足。出于手足之情，我有责任将她结局道出，以给喜爱过她的人一个完整”，也给家人一个完整，而血的相连，心的相通，不因死的隔绝而断裂，哀婉的情思娓娓溢出。尤其是“我”与七哥之间，是带有血缘与家族伦理双重色彩之上的生命相连，“父亲去世后就是舜拴带着我来，一人一碗酪，一人四块炸糕，完了还要添一碗八宝莲子粥，直吃得弯不下腰，才拉着我的手顺金鱼胡同慢慢遛回去。遛到东四牌楼，我就又开始‘饿’了，必得让舜拴领到回民老马的摊儿上喝一碗素丸子汤，才肯回家。逢到我嘴上沾有汤迹，他便会弯下腰来用手帕细心地替我擦净，然后拉起手再走，那情景不像兄妹倒像父女”。这样情感记忆也和血缘的宿命一样，使她的叙事者身份具有了前定的性质，这个破碎的家族，这个衰败了的种族，一定要有叶广芩为她们诉说一段伤心往事，并且是以承传着无数岁月轮回的诗化忧伤完成这诉说。

但是，面对自己民族末世的贵族文化及金家子弟的潦倒处境，叶广芩所持有的情感

叶广芩：《采桑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第2页。

叶广芩：《采桑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第379页。

是复杂的。在家族系列的书写中，寄予作者严峻的批判意识，满清贵族文化传统将贵族子弟置身于一无所能的废物境地，堕落颓废，懒散、消极、享乐、滑稽迂执的不谙世事，消极意义不言而喻，并上升到对普遍人性弱点的透视。另一方面，作者走出国门，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摆脱了体制的重压，时代和观念的禁锢，种族的无意识与个人的无意识一起冲破头脑的防线与思想的禁忌，用从容淡定的创作心态，从文化，历史、人生与生命价值的审美角度，回身反顾自己的血缘来路与文化来路，书写出了诗意的贵族生活方式，以及儒雅闲适的贵族形象，呈现出贵族文化高雅脱俗的另一面。金家子弟在历史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家国覆亡的末世情境中，固执保留了贵族的清雅高洁，对尊严与气节的固守，贵族式的虚静无为中有着对于生命本真价值的追求，对文化精神无偿的执着与崇尚，而这一切原本就是我们民族值得骄傲的精神传统，是融入在这个种族文化血液中的基因。七哥是叶广岑倾入热情最多、给予赞誉最多的亲人，成为了象征性的人物，也是评论者必须阐释的对象，他作为贵族的文化遗民，是满族文化精神执着的守灵者。七哥一生贫困潦倒，在晚年生命危机的时刻，面对强权与金钱，却坚守住家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保持了自己人格的独立与精神操守，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他身上体现的贵族精神，已经融合了中原民族儒家的风范，习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格理想，其中还有士大夫阶级隐逸的传统，在纷纭乱世，他把生命的价值寄托在工笔丹青、紫箫之中，超然于残酷卑污的俗世纷争之外，葆有淡泊、宁静的士大夫心态。关键时刻，则将生命、金钱置之度外，以其衰弱的病体和孤独的灵魂，演绎出螳臂挡车式的悲壮人生绝响，让读者感受到七哥病弱的身躯中激扬的凛然浩气。

《醉也无聊》中老姐夫作为贵族精神的另一种化身，与七哥坚守的贵族精神有着质的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老姐夫与那五一样，映照出满清封建王朝衰朽不能自拔的历史必然。然而用文化审美的眼光来看，八旗制度造就了满族人对于文化的痴迷，而贵族子弟少了物质的羁绊，在历史的延续中，文化自然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只有隐逸在钟情的文化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文化对于他们有着对于生活艰难的逃避，是找到摆脱生存种种限制的途径，并在有限的质空间中达到“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他们超越一切物质尘世，自由驰骋在自己钟情的文化空间之中，追求生命的本真状态，他们在正统文化的体制约束之外，追求的不是儒家标榜的人格道德的完善，而是对于个体生命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多了一份艺术化的洒脱和超越型的智慧。只是在晚清王朝崩溃瓦解、国家需要救亡的特定历史情景下，精致的贵族文化、优异的禀赋，才将这些贵族子弟置于废物的境地，百无聊赖、一无是处。五姐夫，一生行为放达，不拘小节，秉承“无思无虑，无嗜无欲，无秽无累，绝群离偶，神形两忘”，整日饮酒成醉态。少了“竹林七贤”传统名士的放达和鄙昵世俗、笑傲世俗的精神发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享受，一种道家的消极无为，这种生活方式与革命无关，与世俗无关，完全沉迷在自己修道筑的精神世界中，时刻践行着道家的安时处顺、知足常乐，即使外边风云变幻，我自逍遥自在，纯任自然，少了世人为外物所奴役，心为形所奴役，逐渐被异己

的力量所物化的悲剧结局。这样的飘逸与空灵，使他超越了这个没落贵族之家所有人凄凉的情感基调，作为传统文化的镜像，也映照出当下浮躁浅薄的世风中，疯狂放纵物欲与争权夺利的人们迷失生命本色的虚妄形态。

在当下社会，经济大潮汹涌侵袭到日常生活所有角落，大众文化带来世俗性狂欢，导致民族文化的鄙俗化，消费文化大行其道，高雅文化没有市场，世俗精神的迅速膨胀，人文精神的跌入低谷。使以人文精神为家园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面对这样的精神荒原，都试图返回传统，寻找精神价值的生存空间，重建意义空间。叶广芩笔下人物体现的贵族精神，在这种整个社会喧嚣的大环境中，带给人们一种优雅闲适、舒展含蓄的精神享受，一种审美理想的生命态度，在现代多元文化语境参照中，更凸显出人格独立的可贵品格，精神自由的唯美境界。而处于边缘的贵族精神，在现代社会官商垄断的现实挤压下，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而且渐行渐远，带给作者心灵以空旷之感，维系作者情感记忆的精神灯塔逐渐暗淡，这也是她乐此不疲书写家族史的最大诱因。叶广芩作为满族文化的切身体验者和主体承载者，浸润着贵族文化的熏陶，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深切的体认到自我的特质及其与他者的区别，在对自己种族身份确认的基础上，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文化精神的认同，也以贵族精神为主要依托，完成抵抗鄙俗现实的顽强的自我确立。这是面对凄凉宿命的生之顽强，也是作为一个种族的言说者对于历史一份别无选择的承诺。

## 二、平民化的身份转换与融入中华大伦理的归宿

尽管贵族文化精神中有着值得怀恋的超越性价值和富于诗意的生命理想，但这种精神追求在世俗化的文化语境中显得那么的微弱。更何况奢侈、腐朽、堕落与这种精神相互纠缠，更没有抵挡外来暴力的力量。但作者在创作中寻寻觅觅，继《采桑子》之后，也尝试了一些其它题材的创作，日本故事系列，动物叙事系列和《青木川》等，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贵族精神的原点，回归到她真情所系的家族叙事。新近一系列以京剧剧本命名的家族小说，《逍遥津》《三击掌》《豆汁记》《状元媒》《大登殿》《三岔口》《小放牛》讲述的多是与家族相关的人物的命运故事，可以算作广义的家族史写作，延续着《采桑子》的基本叙事视角，只是拓宽了人物的系谱，其中的一些篇章更多侧重对于母亲一族的言说。以有清一代被尊为国剧的京剧剧目的为作品命名的叙事策略，也同样延续着《采桑子》的创作思路。满族为之痴迷的京剧剧目比古老的小令固定的语言形式更契合这个民族的历史处境，作为传奇的一种形式，从正反两个方面，比《采桑子》更显豁地有了情节原型的特殊意义。她以经典京剧的故事对应家族史中个人的命运片段，通过二者的互文关系，转换出对于20世纪满族家庭在转变的社会环境中兴衰递嬗的复杂感受，有悲剧有喜剧，用戏剧取代诗词的文体更动中，也消解了诗化的凄凉忧伤的情感基调。这是世俗生活侵入贵族之家的历史大趋势在人生命运中的写实，或者说是贵族子弟融入贫民生活的时代记录，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古诗意绪，命运的轨迹似乎仍然重复着历史的宿命。然而对贵族精神的坚守仍是作者一以贯之的文

学主题，并升华开去。叶广芩是勇敢而执着的精神战士，她以笔为武器，在人类精神的世界中，缅怀人的灵性与尊严，期盼着文学能给人带来精神解放的自由，最终实现人类的审美救赎。《豆汁记》、《状元媒》、《大登殿》都以女性气节对命运承担完成主要的情节设置。而《逍遥津》、《三击掌》中的人物，则走出了《采桑子》中贵族子弟对于文化的痴迷，面对丧失了的文化空间与岌岌可危的生存空间的双重危机，终于复苏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活力，走向对于外族入侵的反抗，为追求自由、平等，而逐步回归到中华民族这个大的伦理共同体中。

在叶广芩的创作中，贵族精神不惟体现在贵族身上，也体现在被满族文化浸润的社会下层平民身上，甚至体现在汉族民众身上。《采桑子》和新近的京剧系列，都描写了一些贫苦旗人，没落的宫廷裁缝（见《梦也和曾到谢桥》），宫女（《豆汁记》），南营房的丫头（《状元媒》、《大登殿》），她们在皇城根下，从血脉传承着文化的理念，耳濡目染着贵族的精神，从行为举止到言谈话语都释放出雍容、醇厚的精神气质，虽然没有贵族箫、竹、棋、画、诗的精致趣味，但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与贵族后裔一样高洁、平和、坚守气节。而作者将这些贵族精神特质更多的赋予了女性形象，承担了救赎的重要功能。在《采桑子》中，叶广芩对女性身上承载的贵族精神特质的书写，早已初露端倪。《不知何事萦怀抱》中的四格格面对红卫兵的毒打，悲壮而不屈的凛然浩气令人钦佩；《梦也何曾到谢桥》中的谢娘，虽以低贱的缝补活维持生计，但她却总把自己和庭院收拾的干净利落，贫而有节，永远保持着矜持与庄重的尊严。而在京剧系列中，她的这种意向更加自觉。《豆汁记》中的宫女莫姜一生坎坷悲凉，11岁入宫，陪伴太妃17年，因没有找到合适的替换人选，错过了出宫嫁人的机会，但她毫无怨言，28岁嫁给吃喝嫖赌的御厨刘成贵，因保护太妃赐给的偏方，被刘砍伤，当被用作赌注输给别人后，受尽折磨的莫姜流落街头。数年后，刘成贵带着与妓女生的儿子投奔莫姜时，善良的本性使她不计前嫌，接纳了他们。刘成贵晚年瘫痪在床的时候，莫姜精心照料，一勺一勺把些个糊状的东西，喂进他那张喎斜的嘴里，细致与耐心，“不异关照一个婴儿。”而莫姜一脸的平静与爱意。这简直是母性的颂歌！莫姜在“我家”帮佣时，以勤劳、善良与精湛的厨艺赢得全家的好感，而莫姜喝豆汁的细节与京剧剧情恰好相反，莫姜斯文、沉稳与矜持，与原京剧中人物的狼吞虎咽、横筷子唇的形象形成反差的张力，她的善良忠诚也对照出男性莫稽的不义与寡情。“文革”祸起，刘成贵之子带人来家中造反，莫姜舍身保护有恩于她的父亲，最后因怕自己给主人一家带来麻烦，而与刘成贵一道结束生命，惨烈如斯！作者在《豆汁记》中的叙事的重心，已经跳出了人生悲惨命运的单纯喟叹，而是对莫姜平凡而伟大人格的阐释。对于底层民众来说，苦难几乎就好似宿命，特别是在政权频繁更替的历史动荡时期，莫姜面对宿命的善良、坚韧、淡定与牺牲的精神，闪烁着人类精神的高贵与永恒理想。

《状元媒》、《大登殿》是讲述母亲出嫁前后的连续故事。母亲，作为南营房贫民胡同的老姑娘，父母早亡需要照顾弟弟，30岁才出嫁。在洞房之夜得知所嫁之人，不但岁数大自己18岁，而且家中还有一个夫人。她不惧夫家名门贵族的社会地位，为了自己的尊严大闹洞房，并追到天津向状元媒人讨要说法，她的理由是：怎能做小老婆？！媒

人用明媒正娶，坦荡磊落为理由，说服母亲安心的回到夫家过日子。贫弱女子、老姑娘，尚为了一个名分如此周折，对比当下聪慧、文静的亲戚博美为享受而给阔人当“二奶”，让人不禁为女性人格文化的失落深感唏嘘，对母亲的肃然起敬。这关乎着女性的尊严，也关乎着人类的尊严，是所有文明永恒的主题，体现在下层满族人物身上，有着超越阶级的高贵。老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正在消散，文化的拯救难以为继。只有作者笔下的谢娘、莫姜、母亲这些贫苦旗人，还在持有高贵的尊严，继承与坚守着历史长河中文化传统的精髓。

在叶广芩的家族叙事中，在国家民族危亡撕开的文化裂隙中，也诞生了渴望独立的“娜拉”。但是这些人物没有像老姐夫、七哥等人物形象那么丰满生动，虽然也是亲人，却隔了一层，有着粗糙与敷衍的草率。大哥金舜铎，三姐金舜钰和《三击掌》的王利民，三个人颠簸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背离自己的家庭，投身不同党派的革命事业，他们的动机继承了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与道义担当的牺牲精神，是家族中的另类。在参与民族国家新的创世纪中，他们选择了跳出历史宿命的勇敢人生，血液中沉睡的英雄基因苏醒在一个悲愤的时刻。而最终的牺牲，也是文化身份转换失败的寓言。侥幸生存的大哥，获得新身份（主流政党的官员）之后，在的政权交替的历史转折中，只好开始新的奔逃，彻底背弃了家族与传统，连血缘连接的亲情也荡然无存。这是所有的人生悲剧中最冷酷的一面，也带有寓言的性质，要求生，要改变自己的种族文化身份，要在新的文化结构中获得地位，只有放弃血缘规定的种族文化身份。无论生死，他们都是这个家族中的传奇，可以理解的只是反抗暴力的血性，而以暴力的血亲仇杀与制造劫难的历史功过，都是作者在书写中不愿深入探究的情感怆痛，只能以寓言的方式，大而化之的叙述他们的传奇。

在京剧系列的《逍遥津》中，青雨则是另类中生动可感的丰满形象。戏剧人物汉献帝抱怨自己是老虎失威，是孤魂怨鬼，而这出戏剧在文中反复出现，家国之恨在外族入侵的历史危难时刻，尤其意味深长。作为旦角的青雨，原是在无奈的处境中，从寻求精神的寄托到为了生存下海，继而身不由己的与汉奸厮混。在男权政治的舞台上，他以优美的女性形象亮相，本身就极端隐喻了被去势的昔日贵族身份模糊的尴尬，反映了当时多数满族人无奈的生存状况与消极的精神状态。而事态的恶性激变，则使他的民族意识与男性意识觉醒爆发。父亲去世，青雨不能送走父亲，却仍要用清丽秀雅的女子之身娱乐残暴的侵略者，所有的屈辱聚焦于此刻，深深的触痛了青雨血缘伦理的心理承受底线，彻底地粉碎了为“供养家人”下海的初衷，也使他明白悠闲自在、潇洒散淡的生活不再回来。他终于换上中国男人的标准装扮，夺下日本士兵的枪，愤怒地扫射屋中的侵略者，舍生取义成就了这个家族最灿烂的传奇，这也是血液中沉睡的英雄基因再次被历史激活。服装作为意识形态的符码，在连续的更换中，由去势的颓靡到觉醒的振奋，也是寓言性的叙事，重合了多重的寓意。首先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转换的艰难，其中有对贵族精神的质疑，因为处于被去势的边缘地位，灾难来临的时候，只能躲在自家的院子里；外族的暴力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伦理归属的历史契机，当血缘伦理受到空前践踏的时候，种族的意识便从边缘汇入中心，压抑的生命力也爆发出男儿的血性，以自己的方式

投入到抵制外来暴力的全民族抗争中。种族的身份由此弱化，而以空间为基本象征的中华民族伦理共同体，使新的文化身份顺理成章地得以确立。他以自己的牺牲，唤醒了种族强悍的祖先记忆，昭示了这个民族文化归属的终极方式。贵族的精神也在成熟得近于腐朽的文化肌体中，得到一次凤凰涅槃式的重生，比斗蛭、溜鸟、唱戏更隐秘地流动在他们的血液中，一遇时机便慷慨张扬。仍然是诗的精神，只是忧伤转变成了悲壮，小令的轻柔变成了史诗的雄壮。

至此，叶广芩的创作由种族身份确认，到文化精神的阐释，到贵族精神的确立，再到民族伦理共同体的归属，走过一个螺旋形思维的发展轨迹。作为一个宿命的历史衰败中溃散种族的代言人，叶广芩的自我确立过程也是这个种族由边缘汇入中心的过程，体现了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重新自我确立的唯一方式。而她所理解的贵族精神中已经包含着儒、道等中原精神文化的元素，是这个历史归宿漫长的序曲，文化精神的融合比政治的整合更久远地影响到一个种族情感向度。而不可战胜的民族气质，也是这个种族在惨烈的归属过程中自始至终的精神支撑。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面对历史新一轮的腐败与堕落，这个种族的贵族精神仍然释放出抵抗的心理能量。

叶广芩既是这贵族精神的阐释者，也是这个精神的守望者！



## 第二章 质疑历史与探讨人性

如果把历史当作一个客观存在本文来看待，那么作家关于历史的叙事就是针对历史本文所进行的阅读活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视角，切入历史过往时间的缝隙，以文学话语叙事想象中的历史，便是以当代的方式参与历史叙述的建构。这样，历史叙事本质上可以归结为，站在当下立场上，在时间的末端，对过去进行反思和质疑，力图寻求合理的理解与启示意义。在《采桑子》中作者以广博的情怀，为在历史与文学中遭到嘲讽的满清贵族正名，在他们的各种劣迹中，发现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精髓的理解与绝望的坚守，可以见出作家独特的创作视角，历史一开始就是她写作的灵感源泉。只是，她那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是以家族为核心，而她的家族又与中国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筋骨相连，以亲情为主要审美对象的家族史叙事，自然也受到政治史所制约，是家族离散的宿命悲剧最主要的根源。《采桑子》之后，她写作了一系列与家族历史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题材小说，《日本故事》对战争子遗的重新审视，打捞起被历史遗忘的人生命运；《青木川》以解放战争为背景，在各种不同的言说的方式中，探讨了历史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实际上这个叙事动机可以追溯到她早期的《乾清门内》，最初的写作就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开辟小说叙事的维度，《采桑子》开始的家族史写作，则是从试图从政治史主流言说中逃逸出来的挣扎。而《日本故事》、《青木川》的历史书写则是向政治史叙事的回归。而这一段政治史又与她的家族史同步，所以视角的移动中，仍然有着心灵不可抚慰的隐痛。开始了她对于历史情境中人与人性的发掘与考量。她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历史叙事，表达的是对于历史深不可测的疑惑，在解构正史叙事的同时，也质疑了民间的历史叙事，在复杂性的感叹中，充满对于历史真实的虚无感。边缘文化身份的叙事立场，又帮助她在回归中有一次成功逃逸。而打捞起来的历史碎片，则是人生与人性的多样与复杂。

### 一、复杂的人性与复杂的历史同构

叶广芩的历史叙事，把目光聚焦在边缘人的命运上。《雾》中的慰安妇张高氏、《风》中的汉奸史国章、日本军人、《青木川》中土匪魏富堂。这是一些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都十分模糊的人，和她家族史叙事中人物的文化身份有着共同的焦虑。他们的身世命运与被封存的历史真相有着相似的神秘性，一向都被主流政治史的叙事所省略、遮蔽与遗忘。也被主流政治史叙事的思维规范所排斥、放逐，被遗忘的命运成为历史的常态。而作者怀揣还原真实的极度好奇与重构历史自觉的责任感，凭借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努力捡拾起被宏大历史叙事丢弃的偶然、零碎、不连贯的场景与碎片，用人性的复杂与多维，重新搭建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之间的时空桥梁，弥合着历史话语的缝隙。在某种意义上，写历史就是在写人性，因为历史是人的创造物，必定有着时效性，而关于人的故事才有希望到达永恒的彼岸。而发现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复杂性，有着相似的同构关系，是作者最大的收获。

《日本故事》的写作，体现了叶广芩建立在民族大的伦理共同体中的坚实认同，抒发了浓重的爱国情怀。作者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记叙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带给中国人民从情感到精神的巨大创痛，揭示了日本法西斯凶残、灭绝人性的豺狼本性。但她并没有囿于民族主义狭隘视野，而是“上升到人类学的高度，反思战争与人性、历史与个人等重大命题，以普遍的人类情怀批判中日两民族人性中共存的冷漠与残忍，对战争中饱受摧残的生命与灵魂投注深切的哀悯与关怀”。在战争这种极端残酷的环境中，生命是极其脆弱渺小的，人们在这种生存的极限境界中，将人性中的善恶美丑全部且肆意的释放出来，一一展示。但是在反思中日战争的历史书写中，叶广芩并未像老一辈作家那样，直接描述战争中金戈铁马、折戟沉沙式的豪迈，而是以新的历史空间感和时间的距离，讲述战争中的普通人。在人物的塑造中，也不像革命历史叙事的一般道德评价，将人性中的善、恶绝对的分离对照，以简单的逻辑关系处理复杂的历史事件，而是探讨和表现出由于战争而彼此冲突着的人性，并凝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维可能。而体现作者高贵精神的，是在人性的洞幽发微中，叶广芩不仅仅只关注受害的中国人，而且对这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日本法西斯，也以人道的情怀，挖掘他们在战时环境中的人性困境。在战争的疯狂运转的机器上，人们无从把握自己命运，无法掌控事态恶性的循环，这一战争的历史宿命令人性变得复杂和不可琢磨。《风》中鬼子西桓秀次要寻找的汉奸保安队队长史国章，其真实身份竟是一个地下党，他要打进日本内部，获得日本人的信任，最终都是为了获取鬼子的可靠情报。但是，这却让史国章付出痛苦的精神代价，并且以遭受极刑结束生命。虽然，史国章每次提供给鬼子的情报，都让日本人难以得到好处，但仍然有中国军人被杀、农民被抓夫，妇女被强奸。鬼子每一次的清剿，都是保安队为先锋，为着善的目的而不得不去行恶，这对于史国章无疑是掘心自食，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精神苦役又有多少？！参加过临州城报复性大屠杀的日本军人松村武，反复的和“我”说，他厌恶战争，厌恶那些煽动日本人民走向生命绝路的战争贩子，松村为五十年前的事谢罪，“跪在榻榻米上，将一颗白发苍苍的头深深地伏下去，久久没有抬起来”。不可否认，像松村武这些踏上中国领土为非作歹的日本军人，为恶的心理动机与外部严峻紧张的情景刺激、激发、逼迫有关，如果日本没有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军人没有受天皇的征召，如果没有屠杀，没有生命紧张的对峙，他们也许会在国内幸福、平静地生活一辈子，人性中恶的黑暗本能也许将永远被理智压抑在潜意识之中，得不到释放的机会，也不会成为超我所煽动鼓励的自觉，并付之杀戮的残暴行径，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杀人恶魔，人性就这样扭曲和变异为兽性。《雾》是作者从最为尖锐的慰安妇话题说生发开去，她辽远透彻的眼光，批判了中日两个民族国民性中共存的冷漠与残忍，并对慰安妇张高氏投以深切的哀悯与关怀。张英作为一名抗日战士，在接受中共培训以后，与另外两人赶赴工作的途中，不幸落入法西斯的魔爪，沦为他们发泄兽欲的工具。从此以后，张英变成慰安妇张高氏，“高”是日语“五”的谐音，数码化的编排首先使她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一生从此被彻底地改写。在叙述她屈辱而艰辛的悲

李春燕；周燕芬：《行走与超越》，《小说评论》，2008年5期，第50页。

叶广芩：《日本故事》，昆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05页。

苦一生时，作者的叙事态度可以说是刻意做到内敛，在沉静的写作状态中，更为冷静地获得了一种审视人性黑暗和丑陋的澄明境界。“雾”在这里有着明确的承载意义与象征功能，象征着在历史叙事重重遮蔽的幽暗底部，个体生命真相一次次被扭曲，传递出作者对人物多舛命运的哀叹，同时揭示人性中共存的冷漠、残忍与贪婪。“慰安妇”这个令文明社会所不耻的文化标记，像原罪般的宿命追赶着张英的一生，不仅在战争中被异族摧残侮辱，就是在成功逃离之后，还要受到同族男女的鄙弃，甚至那些秉持“正义”的同族男人们，以像阿Q一样的荒诞逻辑，“日本人动得，我们为什么动不得”，肆无忌惮地羞辱她。除了老孙目睹过日军暴行，尚能体恤这位不幸女子之外，没人给她心灵上的慰藉与关怀。性别身份超越了种族与国界，体现出作者对男权——父权制度长期积淀的文化心理导致的施虐恶行，深刻地批判与强烈的愤慨。在新的历史时代，“慰安妇”问题重新得到正视，但张高氏仍无法摆脱受害者境遇，她陷入新一轮的利益陷阱，被新的传媒话语权力掌控着，其中包括了经济、政治、权力等多方力量的角逐博弈。她的养子为了谋求赔偿金，女政客修子为了跻身政坛，热心的普通日本女性为了满足好奇，都以堂皇的口实、看似无害的“善举”，伤害着老人的情感与心灵。在众目睽睽中，大家脱下了张高氏的衣服，却瞬间击中了张高氏最不堪的伤痛记忆，“她想不明白，日本男人脱她的衣服，为什么日本女人又将她的衣服脱了，让她光着身子站在大庭广众面前”，让人们从各个角度欣赏着、评论着。作者有意识地交替叙述两个历史时段的场景，历史是惨烈的，现实是冷漠的，两相剪辑、叠加，却都笼罩在人性阴晦的雾气中。这二者加诸于“张高氏”的伤害，似乎只在于程度的差别。尊严的倍受践踏已经深烙在张高氏的头脑中，如梦魇般随行。无论是一个女性被强暴失去尊严的最初时刻，或是一生因此而受到同胞的鄙弃，还是新的时代语境中成为各种欲望的砝码，使张高氏屡次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慰安妇以身体标示的符码意义，囊括了种族身份、性别政治与话语暴力的复杂内容，而“人”的尊严一再被漠视、被践踏，则是人性黑暗的本能。文本蓄积的悲痛力量攫住了每个人的心，不愿沉浸其间，却又难以忘怀。

在《青木川》中，回响着两种以上的叙述声音，这类似于巴赫金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到的复调模式，只是比复调更复杂，是多声部不和谐的思想撞击，也是历史叙事最原生态的呈示。这使小说有别于传统叙述中历史线性发展的单一叙事模式，拥有着穿越古今的广阔时空跨度，使故事的叙事丰满而富有张力。加之诗化的人性书写融合其中，颠覆了人们一贯的伦理判断，粉碎对土匪固定认知思维模式，将被历史囚禁的秘密解救出来，去反抗历史的含混和谬误，褪去土匪残暴的文化身份，还原了一个历史人物复杂而真实的血肉之躯。以一个对文明充满向往的农民富于个性的土匪经历，完成了作者对于历史叙事的质疑。主人公魏富堂出身深山贫寒农家，从小与牲畜野兽为伍，形成他优于其他孩子的机警与野性的勇敢，生存的艰难磨砺出他胆大心细而又敢做敢为的性格。由于天灾的生存困厄，他主动入赘到富有刻薄的刘家，给满身臭味的痨病女子做上门女婿，他没有父亲的窝囊，也没有其它上门女婿的俯首帖耳，从举行结婚仪式开始，就向老丈人示威，凭着原始野性的狠劲很快掌握了刘家的大权，气死老岳父，鸠占鹊巢。魏富堂利用刘家的资本和根基，自己灵活的头脑，从卖油开始迅速暴富。加上种种仗义

行为，很快赢得乡人的称颂与拥戴，聚集了一帮兄弟。二十出头，便为了一个女人，杀死了当地鱼肉乡里、欺男霸女的民团团总魏文炳，抢了汉中军阀送给陕西督军的一车大烟，变卖后采办枪械，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从此走上了一条和普通农民迥然相异的另类人生，也踏上一条生命的不归路。他种过鸦片发过大财，投奔大土匪王三春当过铁血营营长，由于一再出现的偶然机缘，结识知识女性谢静仪，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启蒙和熏陶，竟然收敛了暴烈野蛮的天性，逐渐变得平和宽容，有了建桥修路办学校等一系列仁爱之举。在历史再次急剧裂变的解放前夕，魏富堂拒绝外甥铁杆土匪李树敏拉拢，向新政府缴械投降、接受整编，使青木川免于生灵涂炭。然而，却在随后的“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直到几十年后才平反改正。这也是历史的宿命，反与降都无法逃避政治审判的最终结局。这部作品也有寓言的意味，原始生命力的野性遭遇现代文明，在党派之争的喋血围剿中，找不到突围的路径。而野性生命嗜血的本能，也只有在现代文化精神的感召启蒙之后，才能把生命力由破坏的向度转向建设的良性循环，文明的生命魅力是比党派斗争的铁血逻辑更有力量的规训。

在魏富堂这一生中，承载了太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义。他半魔半佛，善恶同体，心狠手辣又文明向善，是一个真实、饱满又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在一种人性的悖论中，也寄予作者对于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审美的激赏。叶广芩正是“凭借着魏富堂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而实现了对于意识形态立场的超越”。叶广芩在讲述这段被历史尘封的生命传奇的时候，基本的叙事伦理是倾听，借助当时在场者的追忆，把所有的声音组织在叙事的时间序列中，在一个有限的文本空间中，容纳了历史叙事的多样言说方式，形成多声部的交响效果。这些都意味着那一段历史状态本身的复杂性，也超越了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段纷纭复杂的具体历史，以及有关功过的意识形态评说，以超越党派的历史观为叙事的基本立场，在理性精神观照下，表达了自己对于所有历史叙事的质疑。能够确信的并不是历史的结论，而是和复杂历史一样复杂的人性，以及两者之间同构的关系。

## 二、历史迷雾与价值的虚无

叶广芩对历史的书写中，一直致力于还原历史的真相，找到对于历史的合乎理性的叙述，但揭秘的冲动总是消解在历史“雾”一样的神秘谜团之中。无论主流的历史叙事，还是民间的历史叙事，都充满了虚构的成分。在官方是意识形态的逻辑，在民间是传奇。即使竭尽全力，还是陷入历史怪圈制造出的迷雾之中，像盲人摸象一样不得要领，只能得到一些无法拼接的片段与零碎的细节。她珍藏着这些片段与细节，结构成探寻的过程，历史的叙事由此成为解构历史的探秘。她不仅消解了历史的主流叙事，也解构民间的叙事，在彼此矛盾的多种声音之间，建立起对话的关系，也弥漫起失落和迷茫的虚无之感。战争已成为历史，青木川、魏富堂也已成为历史，后人无法想象那个时空中所有的反抗与陷落、阴谋与杀戮、本能与浪漫，只有记忆的片段与零碎的细节，印证着曾经发生和

王春林：《历史真相的文化想象与人性的深层透视》，《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3月，第55页。

可能发生的存在。

这样的历史观也使叶广芩发现了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相近的同构关系，并且充分地运用这个关系，把历史的悬念放置在小说的悬念中，使探秘的基本冲动物化在她历史叙事的形式中。《风》的悬念设置令人称道。一连串的疑问开启叙事的门径，鬼子在寻找汉奸？汉奸被鬼子活剐？寻觅由此上路，“在叙述历史时，作者将它作为与现在相关的、流动着的态势加以把握，使‘我’得以进入到历史中，在历史的时间之流中感受到现在的时间性，去与过去的时间相遇。”随着情节的推进，悬念不断地升级，调动起读者强烈的解密欲望，故事在层层置障的叙事技巧中，把历史与人性复杂关系的谜底，呈现在读者的视域中。其中仍然有遮蔽，有未知的大量情节，西垣秀次的有意隐瞒是其中之一，而作者的有意省略也是历史迷宫形成的因素，比如叙事者“我”的叔父与主人公史国章被剐而死的相同结局，暗示着这是一个人的事迹，但是最终也没有明确这个结论。作者在努力查找各种官方资料数据，但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为什么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呢？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无论大写的历史还是民间的历史，都以一种含混而虚无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不清，历史成为掩盖真相的重重迷雾。虽然最后在作者的努力寻找中，大致将历史的真相勾勒出来，但真相的残酷，令人震惊，难以接受。鬼子和汉奸、正义与邪恶、亲人与敌人，所有原本清晰的概念都在追寻中逐渐模糊，随着悬念的逐步破解，与真实历史的距离竟然越来越远。迷离故事中残酷的真实结局，也是叙事者无意识中回避的本能，这是悬念无法彻底破解的心结。历史的真相虽然没有整体呈现，但是它的碎片在时间中漂流。在被不断修改的历史叙事中，当事人的身份不停转换，“汉奸与英雄”、“叛徒与卧底”的身份判断，在极端的话语体系的对抗中，对死者已经无关紧要，对后人的命运则影响深远，历史也已这样的方式继续。自称是史国章的孙女，想以史国章以他曾经的“汉奸”身份为资本，试图获取留洋东瀛的机会。英雄的光辉不如“汉奸”的骂名实惠，这是重实利的时代风尚中，民族基本历史价值消解的可悲方式，《风》的寓言性也由此显豁。

如果说《风》是以英雄价值的消解表达历史的虚无感，那么《青木川》中曾经的八路军教导员冯明，则是在自身理想价值的消解中，表达对历史不可逆转的虚无感受。冯明满怀激情地参与了当年青木川所有的政治改革，土改反霸、建立新政权等等。这块土地是他践行革命理想的精神圣地，也是他生命华彩乐章演出舞台，刻骨铭心的初恋情人长眠于此，创世纪的双重意义都维系在这个方舟一样地名中。这个已经无所作为的老人，已经进入怀旧的时间形式，以生命最后的热度重返青木川。但是，他看见的现实是对当年理想最辛辣的嘲讽，他随着那一段被人遗弃的历史一起被遗忘，而魏富堂、魏老爷却仍顽固的存留在当地人们的记忆当中。当年跟随他的土改积极分子们晚境凄凉，而且已经七零八落，有的贫病致死，有的在大炼钢铁的现场突发脑溢血倒在小高炉前，有的文革时被逼上吊，有的出去寻找打工的儿女下落不明……，而那些当年被批斗、瓜分的“分子”们倒家道兴旺，土匪的孙子还当了副县长？他热切期待的老人座谈会，竟然开得不冷

潘超清：《置身于历史的旁观者》，《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4月，第89页。

不热,而且经常跑题。他来忆旧,别人却希望他帮忙拨款修路。终于发现与会者大都是魏富堂的亲朋故旧,自己坐在被革命对象的阵营之中。这使他经过两次手术的心脏难以承受,不得不重新思量自己一生奋斗的价值所在,也使他质疑革命的历史逻辑。历史是无情的,它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和人们开了一个无法容忍的残酷玩笑。当冯明听说上面要为魏富堂“部分平反”,其女儿魏金玉要从美国回青木川省亲祭祖、投资开发,当地政府让土改时分了魏家大院的农民们腾房子,他的尴尬终于爆发为愤怒。他不能容忍这样否定历史,也不能容忍自己这样被历史否定,多日的不快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他公开站在农户一边,反对政府的搬迁决定!以至于干部以为他疯了,“瞧这架势,整个一个农会代表,他现在可真是找着感觉了!”这是一个让冯明,让地方干部都困惑不已的基本问题。冯明困惑的是政权依旧而权力关系发生了逆转,人生的价值也被动摇;干部们的困惑,是冯明作为离休的高级干部,怎么公然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让他们这些代表执政“组织”的基层干部难堪?更重要的一笔,就连到青木川找寻历史真相的冯明之女冯小羽,所面对也是普遍的冷漠与敷衍,那一段历史是青木川人集体渴望遗忘的无意识伤痛,只能得到不同身份的人物混乱记忆的口述碎片,追寻历史本真显得异常艰难,而这种追寻的意义也受到几乎所有人的质疑。人创造历史的主观愿望,被历史无意识的发展潮流颠覆了,人还原历史的意义也被匆忙演进的历史所颠覆。剩下的只是旷大的虚无,人的作为在历史的发展轨道上是多么的渺小与孱弱。

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真相难以还原的尴尬,都是虚无感形成诱因,而人性的复杂则是这虚无感最根本的原因。在两者同构的叙事迷宫中,叶广芩完成了自己独特历史观的建构。作品提供的不是真相,是进入历史的方式,与思索历史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但也正是在这种质疑与思索中,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不自觉地被建立起来。正如福柯宣称的那样,质疑以前历史的叙述,并在消解中建构自己所理解的叙述。

### 第三章 自然生命的挽歌

2000年以后，叶广芩在陕西周至挂职，长期蹲点在秦岭自然保护区，与世隔绝，在这种与天地独往来的自然保护区内，这种近乎回归自然的情况下，作者将眼光从关注家族、战争历史，转向对动物、自然生存状态的书写。长篇纪实性散文《老县城》中有着对于文明衰落的悼亡，在完整的城墙，清代道光年间使用的县衙，监狱以及文庙城隍庙，这些文化遗址中，都能清晰地看出这里曾经的辉煌。文明的更迭，使这座古城负载的一切文化价值全部消逝，其间有着作者对于消逝文明的感伤和叹息。而《老县城》另一部分是叶广芩在动物保护站居留其间如实的记述了她所参与实际的动物保护活动的情况，对大熊猫的寻访、对华南虎的寻踪，以及和其他动物如鸟、金丝猴等的接触给她带来的伦理思考。如果说在《老县城》里，她是以纪实的、理性的笔触表达了对于现实的动物保护的思考，那么在一系列虚构性的“动物小说”中，她则以更为感性的方式，传达了对于动物作为“高贵和庄严”的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而这个基本的主题，主要凝聚在动物叙事系列的文本中。动物自然在叶广芩的眼中，是一种作为自由生命个体的象征，代表了一种原始生态的众生和谐，也以自由生命为中心的价值实体。这些都造就了叶广芩有别于以往生态文学常用的自然客观化的书写策略，更是对动物的书写转喻出传统的自然观，小说具有文化精神寓言的特质。这种对自然生命尊重敬畏的自然观，其本源根性来源于满族文化的核心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与生价值观。

#### 一、回归古老的自然观

在与傅光明的对话中，叶广芩曾经这样说道：“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应该对它们的生存方式理解和尊重。它作为生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它存留的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干预它、改变它。”这就是作者自己对于动物即简单质朴却又深刻的表达，以这样的自然观与生命观为哲学基础，有着动物伦理的久远文化思想积淀。她创作出《老虎大福》、《黑鱼千岁》、《猴子村长》、《长虫二颤》等一系列动物叙事小说，卓然不群地屹立在生态文学的园囿中。在她的书写中，动物与自然拥有着与人类同等重要的存在价值，作者用动物的眼光来理解自然与生命，用动物的单纯朴素的思维来反观人类狡诈与贪婪。即让动物自己用本能的行为去表现他们生存的伦理与丰富的内心世界，又让在场的自然与在场的人交流，并在动物这种简单的行为之中唤起人们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形成作者自然主体化的叙事形式。这就不同于以往的生态小说，以人为中心，单纯用揭示环境恶化的事实为主要内容，呼吁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与需要治理的紧迫性，从科学性的角度启发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逻辑的终点是危害人类生存的灾难，都是站在人类自身利益上来考虑的动物问题，让读者看到的只是生态危机的外部现场感，和这种生态危机将带给人们生活上的窘迫处境，读者在唏嘘不已之后，仍回

傅光明：《叶广芩：女人是情感型的人》，《中国邮政报》，2004年6月26日。

归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中去。而叶广芩将故事的背景设在西安版图上最偏远的村落，这里远离现代文明，与世隔绝，人与动物都处在最自然的生命状态之中，她放弃生态报告似的书写，而是主要挖掘出生态问题中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因素，叶广芩的动物叙事，是以自然生命的镜像映照人类生命的自私贪婪与猥琐，在以动物为中心的言说中，反抗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谰妄，完成自我情感矢量的诗化书写，不仅能让读者反观人类人性中幽暗的一面，带给读者的是灵魂的震颤；也能让读者领略到在作者大胆的艺术构思中，文章流溢的诗化情感的魅力。

出于对动物的尊重，叶广芩笔下的动物与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名称，老虎大福，狗熊淑娟，大雁细狗，这是动物应该有的平等权利，也许在动物的世界中，它们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名字。而《熊猫“碎货”》中，招人喜爱的小花熊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杂碎”，这是昵称，是出于母爱一样对动物的爱称。“杂碎”幸福地生活着，做着大家喜欢的人来疯。但最终，“杂碎”还是被接到熊猫饲养基地，听外边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音，看到裂着白茬的木头大笼子时，它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变得焦躁不安，一反常态的撕咬着房中的各种物件，包括救它的四女，这种撕咬是对四女的不舍，是怨恨，是无助的挣扎，而松开能咬碎锄头把，铁锹棍的嘴，寻寻觅觅的凑过大脑袋，依偎在四女的腿上，是眷恋与疼惜。这种富有灵性丰富情感的表达，给读者带来静静的温情，美的享受，而结局都是大家愿意看到的，“杂碎”幸运的返回自然，也许有一天，它还会回来。而《猴子村长》中则不是这番含情脉脉，而是血腥的震撼。猴子作为人类的始祖，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家种族观念，有着深厚的伦理血亲，拥有丰富的生存智慧。这篇故事中的猴群，即使饥寒交迫，但面对眼前的食物，也只观望着，这也许是在以往的岁月中，与人类较量中积淀下来的顽固经验，而面对这个能带走他们生命与自由的人类，这种经验又不得不“世代传承”。老猴作为头领，拥有者王者的睿智与风采，它对这是人类的圈套深信不疑，他担负着家族成员的生命责任，这让他绝不轻举妄动。然而长社爹的出现注定了这个猴群凄惨的命运，老猴与另外一些受伤的猴子一起被锁在大箱子之中。但猴子的骨气不逊色于人类历史上英勇赴死，宁死不屈的英雄，它们到死都拒绝人们的投食，而更为震撼的是，为了阻止小猴去捡食物，母亲竟将小猴撞死在栏杆上，恪守了猴类种群的尊严。老猴是情愿被捉住的，有着与子孙共赴劫难的大义凛然，是对自己险些让家族灭亡赎罪。老猴从容地等着生命消逝的那一天。而作者竟让老猴和长社爹对话。这两位老者在交流中，最终精神上相容相通。但长社爹的营救并没有来得及挽救老猴壮烈赴死，长社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但故事并没有停止，一波震撼未平，另一波震撼迭起。奉山老人向长社讲述了他父亲不打猎的原因，同样在一次打围的过程中，一只母猴携两只幼仔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进入两位老人绝佳的射击范围之内，而母猴在濒临死亡的最后关头，做出的举动，让两位老人永不拿枪。“母猴将背上、怀里的小崽儿一同搂在胸前，喂他们吃奶，两个小东西大约是不饿，吃了几口便不吃了，这时，母猴将它们搁到更高的树杈上，自己上上下下摘了很多树叶子，将奶水一滴滴挤在叶子上，搁在小猴能够到的地方，做完了这些事，母猴缓缓转过身，面对猎人，用前爪捂住



了双眼，母猴的意思很明确：现在可以开枪了”，从容赴死与老猴如出一辙，而那种亲子之情更令人动容。母爱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纯净又高尚的情感，人类有无数篇章歌颂母爱，而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朝代都在延续着，每一位读者都有着对于母爱的感动，而在奉山老人的讲述中同样也会为母爱感动。他让读者为人类的所作所为汗颜，羞愧甚至痛恨。与其说这是作者叙事手段的高明之处，不如说这是作者高贵的自然观念使然。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对自由的追求，为尊严的恪守宁死不屈，亲子之情震撼的母爱，从容地面对死亡和献身精神，这些本属于人类或是只有英雄才有的生命素质，竟更顽强的显现在一直被人类认为是低能动物的身上，把他们视作人类的附庸、工具，实在令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羞惭，一记当头棒喝，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在动物生存伦理和精神意识面前，倾然崩溃。《黑鱼千岁》中也有着作者对于动物高贵族精神的展示——正义的渴望，牺牲的精神。复仇的黑鱼用极其高明的心智，诱惑着自己的仇人，任其用石头砸向自己的头，也纹丝不动，绝不出现纰露，直到时机到来，将仇人拖入水中，共赴黄泉，其悲壮不可尽言。这种对于人类傲气的挑战，不仅让人心里颤抖，更让我们放下障目一叶，深入人与自然生命的基本关系上，寻找回归的道路。

动物叙事主体化让作者在书写中，进入动物的思维，有着对于人类的敌意，对自然有着无限的爱意。《山鬼木客》中，失意的婚姻与来历不明的儿子，这种现实令陈华无措，索性离群索居在山林中，寻找老君岭中传说的野人，而“山鬼木客”这个名字更为诗意。与其说科考是逃避世俗，不如说是回归自然，他有一种“回归故土的放松和自然，有一种与这片山林的和谐与默契，有一种赴约的喜悦与激动”，陈华每天醒来都会发出嚎叫，以表示自己的群属，证明着自己属于这片山林，面对等待吸血的黄蚂蚱，陈华像父亲面对孩子的惯常恶作剧一样，巧妙地化解，更多的寄托了作者对于人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望。他与熊猫三三之间像兄弟又像父子，两个初次见面，一起对坐，一起睡着，醒后又各走各的路。而三三会时常故意摔跤，逗他开心。也有爱捣乱的黑熊壮壮，偷酒，拆帐篷，无法理论。而当陈华下山后，岩鼠，血雉、羚牛、壮壮、三三、云豹都来探查，好像自己的亲人不见而感到担忧、失落与想念。当陈华再次回到人的世界中，更看清了人鄙薄厌弃的嘴脸，而山林是那么的美好。这里人与自然可以和谐相处，而陈华的死又透露出这种和谐理想的毁灭。这伤逝的诗情中，容纳着叶广芩的无比悲观，真实的叙事不过是一次乌托邦失败实践。

在评论动物叙事的时候，评论者好像同时患了失忆症，以往的评论在谈及叶广芩及家族叙事时，时常将她显赫的贵族家世与作品创作联系在一起，进行意义的挖掘与阐释。但谈及这个挂职周至县，写出动物叙事的叶广芩，满族身份却绝口不提。他们都忘了这个叶广芩有着满族身份的皇家格格，在与天地独往来的秦岭，生命意识、伦理关怀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延展和推进，突破人际伦理的界限，并投射到大自然中每个个体中去。而叶广芩的这种生态意识不是来自现代的环保理念，而是来自更久远的文化源头，是她血缘所勾连的满族文化核心价值观，是萨满教原始的宇宙观中自然崇拜与泛神信仰。满

叶广芩：《老虎大福》，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135页。

叶广芩：《老虎大福》，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87页。

族在游牧狩猎的日常生活中，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形成彼此依存的和諧理想。作者将这种原始自然观中的生命仪式挖掘出来，以无比智慧的方式建立起自己动物叙事的伦理观念，启示人类与自然之间基本的关系，感受神秘的自然，唤起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达到维持生态平衡的伦理理想。她虽然没有像郭雪波等作家作品那样，直接塑造出萨满的形象，也没有像达斡尔族的青年作家萨娜的《达勒玛的神树》中充盈着浓郁的萨满教心理氛围的宗教情怀，但是她的自然观却与萨满信仰有着强烈的来自血缘与心灵的共鸣。作者独特的自然主体化叙事策略，其深层动因就是对萨满教中的那些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予以赞赏和推崇。而作品中的神秘故事也是源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表达着人类尊重自然的本源心理诉求，对抑制膨胀欲望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有着道义担当的勇敢，与积极抵抗现实灾难的精神。

在叶广芩的动物叙事中，自然万物是那么的美丽和富有灵性，动植物与人一样拥有着高贵的生命和尊严，有着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整个自然是充满价值的实体，而自然与人类应该和谐相生，这种自然观与满民族萨满信仰中的原始自然观，有着精神的同一性。萨满信仰作为北方渔猎游牧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核心，“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之大成，以万物有灵论作为其思想基础。其信仰几乎不约而同地囊括了原始信仰体系中最古老、丰富的内容。诸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飞禽走兽、草木鱼虫等等，自然界的诸多事物和现象，都被赋予神的地位，被顶礼膜拜，萨满教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然万物被当作神灵本身或神灵栖身之所，以一种对神灵的敬畏感来仰视自然，把自然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来加以崇拜和爱戴。”<sup>①</sup>满族入关后，上层统治者出于思想统一的政治目的，尽力与汉文化融合，禁止人民野祭、屠杀萨满，改造原始的萨满教，又吸收佛教的一些信仰，民间的萨满信仰逐渐沦为跳大神一类巫术活动的末流。宇宙观的意义被压抑到民族集体无意识领域中，但是并没有彻底流失，基本的思想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流转下来。宫廷中有庄严定制的国祭与家祭，设有专门负责祭祀的部门。民间也有偷偷的野祭，萨满的神话传说口口相传，萨满的神灵形象以艺术的方式被民间保存继续，总之，萨满教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部分。这样的历史际遇，反而使萨满教仪式性的成分日益消失，原始的思想却得到保留，并且深深地植根在这个民族所有成员的心灵深处，成为所有生命的守护神。

叶广芩作为这个强悍民族的后人，无论如何被现代文明模塑，血液里却始终融化激荡着萨满的精神，对她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早在《采桑子》中，就可看出萨满教的痕迹。就像八旗子弟的遛鸟、斗蛐蛐、修道，这些满族旗人生活方式的细节，在以修齐治平之术为主的汉族知识分子看来，都是玩物丧志的表现，但是更隐秘的心理原因是一个与自然相依存的民族不能释怀的自然崇拜意识，流溢着对自然的亲近与向往。政治经济地位是其逍遥的物质基础，八旗制度给其他他们创造了制度保障。在《醉也无聊》中，作者让老姐夫用桃枝治好了刘妈的病，而桃枝之所以拥有这样的疗效，是因为桃树是阅览众鬼之恶的东海神仙的居住之所，这就导致“我”在桃树下路过时，总是

① 雷鸣：《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反思》，《前沿》，2009年9期，第128页。

敛气吞声。萨满泛神的信仰中，充满了这种树神的传说，“独棵的古老树和温泉等风水宝地的古老树，是神和鬼栖息的地方，人们不敢在这种树下休息，也不敢砍取这种古老的树，怕触犯这里的神和鬼。附近的人们闹病灾时，在这种古老的树枝上挂彩色布条，祈求神鬼的宽恕。”自然物的物理性能被包裹在神秘的宗教信仰中，其中的敬畏、感恩与乐生，则是现代环保理念思想资源的重要一维。在《山鬼木客》中传说木客这种精灵是与树木融为一体的，除非把树伐掉它才会死。这种神秘化的书写，也寄托着作者呼唤人类对于自然地敬畏。对于她动物叙事中神秘化的叙述策略，满族原始信仰具有决定性作用。

## 二、神秘文化寓言的启示录

叶广芩曾说：“我们不能否认命运，主宰我们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大自然”，有的评论文章质疑叶广芩这种“单靠回归大自然就能解决生态问题，则是不合实际的”，“小说宣扬的回归自然诗意，牺牲文化为代价的，对人而言则是可悲的沦落与返祖。”。这样的评论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文学历来就有着与社会现实对应的坚实关系，而作者和评论家都习惯把文学作为时代的见证，现实社会的真实镜像，并以此作为膜拜的标高。在这种偏嗜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生态小说也未能摆脱中国文学遗传基因这条顽强的链环。生态小说的作者们，“普遍看重对现实的反映以及对指导现实的‘说理’，他们在表现生态危机之真的目标导引下，热中于真实摹写‘生态事实’，注重亲历性素材并执著于个别事实的逼真确凿，相当一部分文本的以写实的结构贯穿始终，”作家如此，评论家亦如此。但如果生态文学的作品中，总是展示生态真实，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作者的艺术想象力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滞，作品的文学性会有所丧失，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警示读者的生态案例。而叶广芩的小说正是舒展了想象的翅膀，加入了神秘的民族元素，其艺术魅力才得此饱满与充盈。在书写中，虽然每个叙事都有生活原型，但作者并没又拘泥于真实的事件，而是发挥强大的想象力，给真实事件灌注艺术的情思，将读者带到动物心灵的王国之中，给读者以独特的新奇体验和陌生化的审美景观，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寓言性的启示。

《黑鱼千岁》、《长虫二颤》、《狗熊淑娟》这三个文本都在人与动物的纠缠较量中，双双灭亡，这里每一篇都具有着寓言性，只是指向的对象不一样而已。《黑鱼千岁》与《老人与海》一样，同样写出人与鱼之间毅力和勇气的较量，但是在这里，不服输的硬汉精神已不再作为高贵的理性而赞扬，人鱼的斗争也不再是以人的胜利而告终，而是人与自然对抗后的共同失败。“儒”这个人物名称在这里具有反讽的意味。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标志，而在它的精神覆盖的国土上，却是无休止的杀生、吃遍动物的“儒”。“儒”

色音：《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环保意识》，《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2期，第78页。

叶广芩：《老县城》，北京：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8页。

汪树东：《为动物而哀歌：生态意识与叶广芩小说》，《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50页。

汪树东：《为动物而哀歌：生态意识与叶广芩小说》，《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55页。

雷达：《当代生态小说的审美迷津》，《文艺争鸣》，2008年8月，第36页。

对人冷漠，只是在猎杀野生生命时，才有着异乎寻常热情，生命才充满鲜活的生气。在猎杀中，他会调动一切的智慧与毅力，达到征服自然生命的目的，在对生命的杀戮中来证明自我，实现自我，获得陶醉的自我满足，终于在猎杀的活动被动物猎杀，这个现世报应的循环结构明显是文化的寓言，这是大自然对他的惩戒。而儒所在的搏熊馆村，周围的黄土，已经承载着千年的血腥与杀戮。这里曾是汉武帝夏秋之交狩猎的皇家围场，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曾在这里一天杀死三十只黑熊，而儒的祖父是远近闻名的猎手，也曾徒手猎杀金钱豹，最后被豺狼掏空肚子，儒虽未与他见过面，但一直把他视作崇拜的精神偶像，祖父的结局也暗示着儒的命运。在循环中的人生，有着相似的宿命，寓言在神话传说的意义空间中展开，儒与祖父的宿命也就有了整个民族宿命的象征意味。在这里可以见出所谓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以猎杀自然生命的罪恶过程为主线，如果人类文明不能阻止或是继续放任人类对其他自然生命肆意的杀戮，文明的价值仅仅是装饰性的华丽外衣，在自然被恶性破坏之后，所谓的文明也会丧失基础。这个怪圈就是人与自然之间永恒问题，在转换到他物种的叙事立场之后，这种文明的伦理基础也要动摇崩溃。无论人类如何掩饰强权，纹饰暴力，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文明与自然共同的毁灭。

《长虫二颤》，书写的是秦岭腹地的一个因蛇多而得名的蛇坪，这里流传着汉武帝射蟒蛇、王莽篡权的传说，这个村子的殷性人家世代以供应京城太医院蛇胆为业，取完胆后用龙胆草把伤口捆好放到养颤池里调养，完好如初，蛇会自己钻入草丛之中。长虫坪视蛇为灵物，这里的人从不吃蛇，也从不私自杀蛇取胆，千百年来，村庄的人与蛇和平相处。而捕蛇者老余来到这神秘之地后，却轻易打破了这里的和谐平静。他是市场化的一种象征形象，在利益的驱使下肆意的扑杀蛇类，而老余杀蛇的场景，更是让读者感到一阵眩晕。“老余拿刀，将长虫肚子从上到下划开，那些肠肚乱七八糟的摊了一堆，老余弯腰在花花绿绿的脏腑中翻找蛇胆，找了半天竟找不着，急了一脑袋汗，剖开肚子的长虫在旁边翻卷挣扎，血糊刺啦，拖着一肚内脏满院里爬。”面对这里人不吃蛇的“顽固观念”，老余鄙夷的说，乡下人不开窍，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进来。而二颤，长虫坪一怪人，介乎人与蛇之间，是文本中最令读者迷惑，带有神秘色彩的人。在母腹中六月就降生，一双蛇眼，没有听觉，身材修长，头扁而尖，皮肤黝黑，身体反射出鳞甲一样的光泽，绕在树上如蛇一般。他终日与蛇为伍，好像能与蛇交流，深夜站在养颤池边，对着满是雾气的养颤池，发出蛇一般“嘶嘶”的声音。最奇特是二颤独特的蛇舞，和着《金蛇狂舞》的音乐，“在阳光里随着音乐扭动着身体，他那活泛柔韧的身子忽而蹲下蜷成一团，忽而站起伸成一条，胳膊随着身体变化上下伸展，‘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爱蛇，亲蛇与蛇交流的二颤对老余充满敌意，总是用厌恶的眼光盯着捕蛇的老余，还偷偷的放走被捕的蛇。而最让读者迷惑不解的是，当经常出现在娘娘庙里，与二颤极为亲密的蝮蛇，被老余杀掉后，与此同时，在邻村的二颤也突然跟着无疾而终。现代化让人们祛魅祛魔，日益规范的理性思维，让人们觉得日常生活只有一般的解释认知，这让人们由超验的神秘世界，返回到世俗生活本身，没有任何的敬畏而

叶广岑：《老虎大福》，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158页。

叶广岑：《老虎大福》，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153页。

言，留下的只有征服、占有等各种本能欲望。神秘感没有了，生活也变得枯燥乏味。这里作者营造了神秘的氛围，把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写得扑朔迷离，作为不同物种相同的生物灵性是神秘感形成的宇宙规律。她在这种交感的神秘状态中，寻找一种最为原始的生命密码，并对生物产生一种几乎神圣化的倾向，期待着人们苏醒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敬之心，由此走出所有生命生态危机共同困境。她的寓言以神圣和肃穆的整体效果，完成对所有动物的虔诚祭奠，替全人类忏悔。和她的家族史写作一样，对日益萧条的自然有着悼亡的庄严。对自然的敬畏、对动物的尊重，也构成她重新思考社会人生精神价值角度。由此出发，追问人在自然中的真正位置，探究人与自然一切生命的本源，谛听着未来文明频频振动的福音。萨满信仰悠久的生态保护传统，神格化、人格化的自然观念体系，自然崇拜伦理基础都成为叶广岑生命诗学的逻辑基础。萨满教万物有灵的信仰，是自然生态系统彼此依存的神学表述。二颤身上被赋予了通灵的能力，人蛇合一，成为蛇的守护者。而蛇在萨满教的众神信仰中是主要的大神之一，通灵二颤也可以解释为寓言中萨满的化身，只是面对这个欲望的社会，萨满人格的意义空间已经被物欲充塞，二颤的失语便有了隐喻的意义，和自然相通的文化精神丧失了表述的能力。作家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上升到文化精神的高度，这使她动物寓言的终极寓意是与自然灵性相通的古老文化精神。

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重要的一项是文化传统中的饮食文化。美食传统源远流长，从各大菜系到满汉全席，处处显示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和文化风习。但是，吃的狂热推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自然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山鬼木客》中，作者曾写到“动物有动物们的秩序和规则，不像人，除了人类，什么都往嘴里填，什么都往身上披。”《黑鱼千岁》中儒的吃法，还是停留在原始烧烤之上。而在《狗熊淑娟》中，淑娟的悲剧是人对美味熊掌的垂涎。更突出了饮食文化价值和动物生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是多么困难。作者用两条书写主线结构全篇，一条是狗熊淑娟在人类意志的摆布下悲惨的命运历程，淑娟是被地质队员捡到的，在返城时，他们并没有将淑娟放回自然，而是带回城里的动物园，淑娟在这次被遗弃中，让它对烟火气的人恨之入骨。林尧是淑娟饲养员，精心照看淑娟，但从最开始，他就知道地质队员干了一件傻而又傻的蠢事，动物园将剥夺淑娟的自由和应有的生物灵性。因为动物园经营不善，所有的动物饱受饥饿的折磨，林尧想尽办法解决淑娟的食物问题，但在林尧生病之际，老病的淑娟被悄无声息的倒卖给马戏团，在林尧千辛万苦找到淑娟时，淑娟满怀着所有的怨恨将林尧杀死，淑娟也遭到被杀的命运。另一条就是杜家经营的红红火火的杜家菜，杜家菜食材讲究精到，鱼翅、鲍鱼、海参、鱼肚、鱼唇、熊掌、驼峰，人们的品尝欲望，已经肆无忌惮的指向各种野生动物，而这对于自然生态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中国饮食文化品的是宁静心态，这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的滋润。这种高雅的精神境界，在淑娟那惨白的趾爪划出的问号下，显得那么血淋淋与苍白。而对于狗熊淑娟、熊猫杂碎、猴子这些动物的悲剧而言，都离不开人类的动物园制度，为了自娱而以牺牲自然生命的自由为代价。对自然生命的救治是以牺牲动物的性灵为代价，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动物园，无疑是人类残暴本性的体现。

叶广芩这些质问都源自对动物生命和性灵高贵与尊严的深切体悟，这些高贵的动物，用自己本能的行动，换回人类的尊重，更唤醒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敬与敬畏。而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功用上，而要看到动物也是一个充满灵性价值的实体。人类对自然生命的长久漠视，在自然的报复、反击中再次看到自然巨大威力，如果人类还跳不出为自身利益而改善环境的肤浅观念，那么即将面临在物质和伦理精神上的双重困境。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生态的健康发展，让人和自然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权力。这是叶广芩动物叙事的文化寓言，给予我们的深刻启迪。因此，文化精神的寓言，也就有了启示录的文体价值。

## 结 语

叶广芩以片段式的家族史写作、以迷宫一样的历史叙事方式和神秘莫测的动物叙事的文化寓言文体，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形象、新的语言风格与新的文体形式。她在种族身份的确认、文化归属的认同与贵族精神的阐释中，完成自我确立的同时，也以独特的艺术感觉，创造出自己意蕴生动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由悲剧的命运构成的各种生命图式，苍凉渺远而诗意葱茏。这个通灵的世界，体现着她对于宇宙生命的无限好奇与庄严的悲悼，是一部交响着多种生命律动的哀歌，悲剧的品格中有着超越性的诗歌精神。她由此建立起自己凄凉的生命诗学，以悠远深厚的文化韵味，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崭新的哲学美学风格。

## 参考文献

### 论文部分：

- [1]邵旭东：《步入异国的家族殿堂——西方“家族小说”概论》[J]，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3期。
- [2]小雨：《叶广芩：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贵族作家”》[J]，小说评论，1998年4期。
- [3]李柏林：《对民族传统文化人格的拷问——论叶广芩90年代的小说创作》[J]，淮南师专学报，1999年4期。
- [4]康艳梅：《时代的暴风雨来了——读叶广芩的〈采桑子〉》[J]，小说评论，2000年5期。
- [5]龙云：《过去的故事：叶广芩家族系列小说》[J]，小说评论，2001年5期。
- [6]韦建国、李凌泽：《托尔斯泰参照下的叶广芩——“贵族情结”解析与本土文化转型探讨》[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2期。
- [7]马国栋：《文化意蕴·双重视角·民族身份》[J]，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4期。
- [8]贺桂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味小说》[J]，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3期。
- [9]孔刘辉、何丽：《叶广芩近期创作的生态意识》，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8期。
- [10]唐克龙：《动物的“高贵与庄严”：论叶广芩的动物叙事》[J]，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1期。
- [11]权雅宁：《繁华散尽归山林——论叶广芩小说的当下关怀》[J]，时代文学，2007年1期。
- [12]郑尤：《以〈雾〉为例浅谈叶广芩的“日本系列小说”》[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2期。
- [13]周燕芬及2005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历史的诗性传达，人性的深度叙述》[J]，小说评论，2007年3期。
- [14]李静：《欲望世界中的〈青木川〉》[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8期。
- [15]冯迅燕：《浅析叶广芩作品与道家文化》[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9期。
- [16]钟海林：《叶广芩小说的多面涉猎》[J]，名作欣赏，2007年9期。
- [17]李永东：《戏剧家族与家族的戏剧性的解体》[J]，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1期。
- [18]王鹏程、袁方：《在历史的缝隙里窥视“土匪”的秘密——论叶广芩的〈青木川〉》[J]，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1期。
- [19]李永东：《异质因素与贵族世家的解体》[J]，理论与创作，2008年2期。
- [20]唐晴川、冯迅燕：《论叶广芩小说的悲剧意识》[J]，当代文坛，2008年2期。
- [21]王春林：《超越了意识形态立场之后——评叶广芩长篇小说〈青木川〉》[J]，小说评论，2008年3期。
- [22]《历史真相的文化想象与人性的深层渗透——对2007年历史长篇小说的一种描述与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3期。
- [23]身历史中的旁观者——读叶广芩的《日本故事》[J]，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4期。
- [24]《生态文学的美学之围——论叶广芩的生态文学创作》[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4期。
- [25]李春燕、周艳芬：《行走与超越——叶广芩创作论》[J]，小说月报，2008年5期。
- [26]周燕芬、叶广芩：《行走中的写作——叶广芩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8年5期。
- [27]白军芳、于唯德：《论〈青木川〉中文学对历史的虚构》[J]，时代文学，2008年7期。
- [28]雷鸣：《当代生态小说的审美迷津》[J]，文艺争鸣，2008年8期。
- [29]孟帅帅：《浅析叶广芩〈日本故事〉对中日战争的反思》[J]，安徽文学，2008年12期。



[30]汪树东：《为动物而哀歌：生态意识与叶广芩小说》[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12期。

**硕士论文：**

[1]曲圣琪：《根植于文化沃土的精神家园——叶广芩小说创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7月。

[2]贾香娟：《叙述欲望——叶广芩及其“家族小说”采桑子》，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3]丁韵：《叶广芩小说试论》，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7月。

[4]许艳：《末世贵族命运的书写——叶广芩90年代小说创作论》，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7月。

[5]赵小群：《论叶广芩的家族文化情结》，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7月。

[6]吕豪爽：《文化超越与审美创新——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精品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7月。

[7]李莉：《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时期乡族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7月。

**博士论文：**

[1]于启莹：《京味·市井·小说》，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7月。

[2]周艳芬：《叶广芩：安置灵魂的一种写作》[J]，小说评论，1998年4期。

**著作部分：**

[1]夏家骥：《清朝史话》[C]，北京出版社，1985年4月。

[2]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11月。

[3]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C]，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

[4]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

[5]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

[6]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7]何向阳：《夏娃备案》[M]，山东出版社，2004年5月。

[8]王平：《古典小说与古代文化讲演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叶广芩作品目录：**

[1]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十月出版社，1999年10月。

[2]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M]，华文出版社，2002年2月。

[3]叶广芩：《谁翻乐谱凄凉曲》[M]，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0月。

[4]叶广芩：《日本故事》[M]，昆仑出版社，2005年1月。

[5]叶广芩：《黑鱼千岁》[M]，中国电视出版社，2005年1月。

[6]叶广芩：《逍遥津》[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9月。

[7]叶广芩：《老县城》[M]，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

[8]叶广芩：《青木川》[M]，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9]叶广芩：《全家福》[M]，北京出版社，2001年1月。

[10]叶广芩：《豆汁记》[M]，中国盲文出版社，2009年1月。

## 后 记

如果说论文答辩是三年读研生活的结束，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开始”少了三年前的迷茫与稚嫩，多了生活磨砺后的成熟与坚毅。而面对新生活的勇气源于陪我走过这三年研究生生活的老师和同学们，是你们让即将远行的我，行囊中装满了温暖与自信。

能师从季老师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您的为人与为学，将使我受益终生。您精湛的厨艺、优美的歌声、关切的赠药，带给我的快乐和感动难以言表；渊博深广的学识、严谨专精的治学态度更让我对为学多了一层敬畏、体悟、谨慎与向往；而您对于我生活选择上的尊重，人生迷茫时的疏导更是让我铭记于心。而令我自己懊恼的是，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初稿、改稿、定稿这一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带给您过多的操劳与费心。

我尊敬的孟老师、贺老师、宋老师、杨老师及文学院的各位老师，感谢你们在学业上和论文上对我的教导和启发。还有尊敬的徐爽老师，感谢您对我生活上的支持、帮助、鼓励和宽容！

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疼爱与包容。

感谢张然、王丹阳、老板让我的生活不再寂寞，感谢“掌门大师姐”春来和才华横溢的赵坤对我的包容，感谢同学小丽、李慧、张璇、陈杰、李卓带给我的快乐……

## 个人简历

姓 名	王雅洁	性 别	女	籍 贯	辽宁省 凌源市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84 年 3 月 29 日	学 士 授 予 院 校	沈阳师范大学	本 科 毕 业 学 校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硕 士 授 予 院 校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习、工作经历：							
1991——1997		辽宁省凌源市刀儿登镇烧锅地村小学					读书
1997——2000		辽宁省凌源市刀儿登中学					读书
2000——2003		辽宁省凌源市第二中学					读书
2002——2005		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读书
2005——2007		沈阳师范大学					读书
2007——2010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					读书
研究成果：							
1、	《叶弥小说中女性的几种生存状态》，《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 年 3 月						
科研项目：							
无							
奖励情况：							
2008 年，《2007 年汪曾祺综述》，获沈阳师范大学“第一届研究生读书报告与科研设计大赛”二等奖							